

蔣介石的臺灣認識—— 從九一八事變到臺灣「光復」

葉 亭 亭

摘 要

本研究以1932–1945年間蔣介石日記為核心，探討其對臺灣認識的演變及考量重點，旨在檢驗並解構「國民政府始終堅持收復臺灣」的單一路徑民族主義敘事。研究發現，蔣的臺灣觀隨戰局與國際局勢而動態調整，核心始終圍繞土地、戰略與國格，而非對臺灣人的關懷。

1930年代初期，臺灣以「光復失地以雪前恥」的民族象徵進入蔣的視野；至1934年，因臺灣被視為日本南進華南的軍事前哨，其認識開始呈現民族歷史敘事與戰略安全考量並行的結構。1942年下半年，隨中美關係深化及注意到美國將臺灣納入戰後亞太防禦體系，蔣認為須及早向美方確立臺灣歸屬中國的立場，並以「共同防禦」構想爭取支持。1943年開羅會議，蔣首次在國際外交場域明確提出臺灣應歸還中國之主張，並在談判過程中刻意避免與美國利益正面衝突，以確保「臺灣歸還中國」一案能被納入《開羅宣言》。

1944年起，蔣著手建構接收臺灣的行政與治安體系，形成「中央直派、外來班底」的人事布局。1945年日本投降後，他透過民族主義敘事建構收復臺灣的合法性，而臺灣社會則展現真誠的民族情感與高度配合，形成政治敘述與社會情感之間的落差。戰後，蔣對臺灣的定位延續其戰時視臺灣為「大中國」疆域與國防安全體系一部分的構想，並以此作為統治臺灣的核心價值。

關鍵詞：蔣介石、臺灣認識、民族主義、開羅會議、國防安全

Chiang Kai-shek's Perceptions of Taiwan: From the Mukden Incident to the Retrocession of Taiwan

Ting-ting Yeh*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Chiang Kai-shek's diaries from 1932 to 1945,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his perception of Taiwan 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s behind it. The aim is to test and deconstruct the nationalist narrative tha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consistently adhered to a single path of "recovering Taiwa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hiang's view of Taiwan shifted dynamically in response to the course of the war and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with his core concerns revolving around territory, strategy, and national dignity, rather than care for the Taiwanese people.

In the early 1930s, Taiwan entered Chiang's horizon as a nationalist symbol of "recovering lost territory and avenging humiliation." By 1934, as Taiwan was regarded as Japan's forward base for her southward expansion into South China, Chiang's perception increasingly combined nationalist-historical discourse with strategic-security considerations. In the latter half of 1942, a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deepen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corporated Taiwan into its postwar Asia-Pacific defense framework, Chiang sought to establish China's claim to Taiwan early on and appealed to U.S. support for the claim through the concept of "joint defense." At the Cairo Conference in 1943, Chiang for the first time articulated explicitly in an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occasion that Taiwan should be returned to China, and he deliberately avoided direct conflict with U.S. interests during negotiation to ensure that the clause in Taiwan's return c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he Cairo Declaration.

Beginning in 1944, he initi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and security structures for Taiwan's postwar takeover, resulting in a personnel arrangements characterized by "directly dispatch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outside team."

After Japan's surrender in 1945, he constructed the legitimacy of Taiwan's return to China through nationalist discourse, while Taiwanese society expressed genuine patriotic sentiment and strong cooperation with the authorities—revealing a gap between political narratives and social emotions. In the postwar period, Chiang's perception of Taiwan continued his wartime view of the island as both a territorial domain of "Greater China" and an integral element of its national defense system. This became a core value of his rule in Taiwan.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Perception of Taiwan; Nationalism; Cairo Conference; National Defense

蔣介石的臺灣認識—— 從九一八事變到臺灣「光復」^{*}

葉亭亭^{**}

壹、前言

2025年，適逢二戰結束80週年。80年前臺灣因同盟國的勝利而「光復」，成為中華民國統治領土的一部分。然而，臺灣的「光復」實非二戰結束的必然結果——同盟國的勝利本身，並非決定臺灣歸屬的唯一因素。臺灣最終被納入中國版圖，與戰時中國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介石的認識、決策及戰略考量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蔣介石對臺灣的定位，深刻影響了戰後臺灣主權歸屬、治理政策及國族敘事，也成為理解現代臺灣歷史發展的重要課題。蔣介石對臺灣的認知，不僅關涉民族論述與政權移轉的合法性，更規範了戰後臺灣人如何被重新定義其國族身分與政治發展的可能空間。

現有關於臺灣「光復」的學術研究，多以民族主義敘事為主軸，將「抗戰／抗日」與「收復臺灣」緊密結合，強調國民政府自中日戰爭¹ 初始即已將臺灣

^{*} 本文初稿於2025年8月17日在國史館舉辦「從中日戰爭到終戰接收」學術研討會發表，承蒙評論人潘光哲老師寶貴意見。感謝兩位審查人惠賜意見，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25年9月10日；通過刊登日期：2025年10月23日。

^{**}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¹ 關於「中日戰爭」一詞，部分學者做出了細緻的區分。例如秦郁彥所著，被譽為「中日戰爭研究之古典名著」的《日中戰爭史》中將中日戰爭分為第一次與第二次：第一次指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第二次則指1937-1945年間的全面戰爭。本文所稱「中日戰爭」

列為重要戰略目標，² 甚至進一步將「光復臺灣」溯源為孫文國民革命的核心理想之一。³ 這樣的歷史敘述直至今日仍是在面對「光復臺灣」時的主流敘述。然而，提出此類論點的代表性研究者如李雲漢、陳三井及洪桂己等人，皆在解嚴前長期服務於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或國史館等機構。在建構「正統」民國史觀與反共復國的大環境下，這些研究往往傾向強化國民政府及蔣介石「承繼中山遺志、始終堅持收復臺灣」的意志，將臺灣「光復」描繪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必然，用以鞏固臺灣作為中國「固有領土、不可分割」的正當性。此種敘事不僅反映當時研究的侷限性，也與孫文對臺灣的實際定位並不相符。

依現有史料可知，孫文本人並未提出「光復」或「收回」臺灣的主張。在其所處的時代語境中，他支持的是臺灣民族從日本統治下獲得有限自治，而非回歸中國。雖孫文並未留下直接論述臺灣問題的完整文稿，但透過蔣介石極為倚重的孫文思想詮釋者戴季陶，我們得以窺見其相關看法。戴季陶於1927年2月5日在黃埔軍校發表〈孫中山與臺灣〉演講時指出，孫文臨終前對日本問題提出兩項基本原則，其中之一即為「須使朝鮮、臺灣兩民族實現最少限度之自治」，並認為「臺灣應取的革命目標，在於議會與自治政府的設置」⁴ 換言之，依戴季陶之解讀：其一，「光復臺灣」並非孫文的革命目標；其二，孫文並未將臺灣與中國視為同一民族。

專指自1937年爆發的第二次中日戰爭，第一次中日戰爭則直接以「甲午戰爭」稱之。秦郁彥，《日中戰爭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7年）。

² 李雲漢，〈抗戰期間臺灣革命同盟會的組織與活動〉，《東方雜誌》，復刊第4卷第5期（1970年11月），頁47；陳三井，《中國國民黨與臺灣》（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年）；洪桂己，〈從開羅會議到臺灣光復〉，收入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4冊（臺北：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5年），頁204-225。

³ 陳三井，〈臺灣光復的序曲：復臺準備與接收〉，收入魏永竹主編，《抗戰與臺灣光復史料輯要》，（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頁79。

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第9卷·革命志抗日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9年），頁113。

這種對「臺灣民族」的定位，再加上孫文生前提出的「弱小民族」概念，⁵深刻地影響了後來中國社會乃至國民政府對臺灣問題的認識與態度。從1920年代後半開始，中國知識界的語境中便陸續出現將臺灣視為「弱小民族」之一的論述。⁶1925年初抵達上海的臺籍人士謝東閔，亦直接指出即便至1944年，中國國內書刊仍有不少將「臺灣人」當成另一民族（如稱弱小民族）等語。⁷也就是說，即使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主體對臺灣的民族想像仍充滿模糊性與多重性，遠未形成戰後那種「臺灣人即中國人」的民族論述。

另一方面，「始終堅持收復臺灣」這樣的表述亦值得重新審視。戰後任臺灣長官公署長官的陳儀與戰爭即將結束時任中國國民黨直屬臺灣黨部書記長兼代主委的蕭宜增對於「收復臺灣」政策的演變過程，有著相似的觀察與回顧。陳儀指出，甲午戰爭之後，中國一直處於國際弱勢地位，長期以來不僅極少主動提出收復臺灣之看法，即便臺人在中國提出「復歸」訴求，國民政府亦未給予積極回應。直到開羅會議才讓收復臺灣成為抗戰的必要結果。⁸蕭宜增則在其主持的臺灣黨部發行之《臺灣研究季刊》創刊號發刊詞中指出，中華民國的對臺政策歷經3個階段；在抗戰之前，對臺政策始終未定；直到1942年宋子文公開表示「收復臺灣」為國策、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昭示：「臺灣、澎湖、東北四省……無一處不是保障民族生存的要塞。這些地方的割裂，即為中國國防的撤除」，中國對臺灣政策乃告具體確立。⁹由此可見，「始終堅持收復臺灣」的敘述，與實

⁵ 孫文曾於1924年發表「呼籲世界弱小民族形成反帝聯合戰線」宣言。此宣言提倡同被帝國主義壓制的世界弱小民族（包括中國），應形成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共同對抗帝國主義。詳請參閱：孫文，〈呼籲世界弱小民族形成反帝聯合戰線〉，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頁131

⁶ 例如李作華所編之《世界弱小民族問題》中，不僅在序言中談及孫文「濟弱扶傾」的主張，亦將臺灣與朝鮮、印度並列為弱小民族之一；王一鳴著的《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亦將臺灣視為與朝鮮、菲律賓、越南相同，皆為弱小民族之一支。詳請參閱李作華編，《世界弱小民族問題》（上海：上海太平洋書店，1929年）；王一鳴，《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9年）。

⁷ 謝東閔，〈認識臺灣、研究臺灣、收復臺灣〉，《公論月刊》，第23期（1944年7月），頁7-11。

⁸ 陳儀，〈臺灣前途的展望〉，《東南海雜誌》，第1卷第6期（1944年11月），頁6。

⁹ 蕭宜增，〈發刊詞〉，《臺灣研究季刊》，創刊號（1945年1月），頁1。

際政策發展之史實存在明顯落差。

相較於早期研究，學者鄭梓的研究則已注意到國府對臺政策的轉折，指出二戰前國民政府的反帝反殖政策主要以民族解放與民族自決為核心，蔣介石對臺政策早期亦多以「聲援臺灣人民民族運動」為主。直至1941年以後，國府對臺政策才逐漸自聲援民族獨立、解放運動，轉向「收復失土」的國家政策。¹⁰ 這類在臺灣民主化之後產出的分析，開始逐步鬆動以往單一民族主義敘事的框架。不過，鄭梓的研究雖然點出了國府對臺政策隨環境與國際局勢的轉變，但仍然侷限於國家整體政策層次，未曾深入探討在整個政策轉折過程中，國家最高領導人，也是對於臺灣問題有主要決定權的蔣介石，究竟在何時、如何轉變其對臺灣的認知，及其在戰時複雜決策背後的歷史脈絡與心理考量。

關於臺灣「光復」的另一條重要研究脈絡，聚焦於臺籍抗日人士，尤其是其所組成的臺灣革命同盟會，強調在抗戰時期積極倡議「復歸祖國」，並主動配合國民政府推動復臺事業，¹¹ 將臺灣「光復」的歷史正當性建立於臺灣人自發的民族認同之上。然而，這類論述卻未探討一個重要面向——即在戰時許多臺籍人士早於蔣介石提出復臺訴求時，蔣介石為何以保留的態度回應了這些訴求。既有研究未曾關注及剖析蔣介石未積極回應背後的複雜考量，亦成為本文想探究的問題之一。

本研究正是綜合上述問題意識出發，運用蔣中正日記等相關史料，從其個人視角切入，系統性重構1932¹²至1945年間蔣對臺灣認識的演變過程，並分析這一

¹⁰ 鄭梓，《戰後臺灣的接收與重建——臺灣現代研究論集》（臺北：新化圖書公司，1994年），頁3-5。

¹¹ 張瑞成，〈臺籍志士與國民政府復臺工作之籌劃——從開羅宣言談起〉，收入張玉法主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7年），頁983-1013；呂芳上，〈抗戰期間在祖國的臺灣光復運動〉，《新知雜誌》，第1卷第5期（1971年10月），頁21-28；李雲漢，〈抗戰期間臺灣革命同盟會的組織與活動〉，《東方雜誌》，復刊第4卷第5期（1970年11月），頁47-52。

¹² 本文認為，1931年九一八事變不僅刺激蔣介石的「國恥／失地」意識，也是促使他重新界定中國疆域範圍的重要契機。然而，事變發生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蔣介石在其日記中尚未立即提及臺灣；直至1932年，方首次在日記中以明確的政治語境提出「收回臺灣」的構想，並將臺灣與東北、朝鮮、琉球並列為應予恢復的「失地」。是故，本文以1932年作為

演變如何受到戰時國際局勢、國內抗戰需求及政策制訂等因素影響，旨在突破單一民族主義的線性敘述框架，深入揭示蔣介石臺灣認識的多層次歷史面貌，進一步闡明此認識如何具體影響戰後國府在臺灣的施政方針、治理政策及人事布局之形成。

貳、臺灣觀的初步構成

一、失地雪恥與王道政治

1931年爆發的九一八事變絕非偶然，實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企圖攫取「滿蒙」之「大陸政策」的延續。1901年玄洋社領袖內田良平創立黑龍會，在日本合併韓國的1905年便已計劃透過移民與推動滿蒙獨立，使滿蒙納入「東亞聯邦」之一員，最終目的則是將滿蒙置於日本統治之下。¹³ 1913年黑龍會與其他右翼團體組成「對支聯合會」，公開主張滿蒙應由中國委任日本統治，以確立日本在東亞的霸權。¹⁴ 至1920年代，日本學界關於「支那」的研究，為配合國家政策，開始建構「滿蒙特殊性」之主張。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教授矢野仁一即是代表學者，其以〈滿蒙藏非支那本來之領土論〉系統化此一論述，聲稱中國固有領土僅限十八省，而滿洲、蒙古、西藏皆為邊疆地方，應屬非在中國統制範圍內的「特殊地域」。¹⁵ 1927年任日相的田中義一更以此為基礎，在「東方會議」上提出討論，並作為侵華的思想依據；以石原莞爾為中心的關東軍亦以此論為基礎提出「滿蒙論」，¹⁶ 最終推動了九一八事變。

分析其臺灣認識之起點。此一時間差異顯示，蔣介石的失地意識雖於九一八事變後即已萌生，但此意識轉化為具體納入臺灣的領土構想，乃在1932年才清楚具象化。

¹³ 葛生能久，《日韓合邦秘史》，下卷（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0年），頁771。

¹⁴ 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二版一刷），頁71-72。

¹⁵ 矢野仁一，〈滿蒙藏は支那本來の領土に非る論〉，《外交時報》，第35卷第1號（1922年1月）。

¹⁶ 古川萬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東京：東京書籍，1991年），頁456；玉井禮一

因此，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一方面實質控制滿洲，另一方面公開宣稱「滿蒙非中國領土」，並藉由扶植「滿洲國」的成立來尋求占領的合法性。這一連串動作不僅可視為日方在華軍事行動上的突破，更是學術論述與長期國家政策相結合後所做出的實踐。此一行動，不僅挑戰了中國近現代疆域的合法性，也激發了蔣介石對失地議題的敏感神經。

就在日本即將承認「滿洲國」之際，¹⁷《蔣介石日記》中再度出現久未提及的「臺灣」一詞。其紀錄如下：「倭寇承認偽滿日亟……預期十年以內，恢復東三省，同為中華人民血氣之倫，當以此奮勉……預期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中秋節恢復東三省，解放朝鮮，收回臺灣，琉球。」¹⁸此一記述，乃自1918年8月蔣氏辭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由廣州北上赴上海途中，因行經基隆港而在日記中簡短提及臺灣後，¹⁹時隔15年再度出現。

兩次提及臺灣的語境具有明顯差異。1918年的書寫主要反映旅途中因觸景而生的歷史感懷，並未涉及臺灣的領土屬性或延伸出更多意涵。然至1932年，蔣介石之所以將目光投向臺灣，則是因為日本積極推動「滿蒙特殊性」論述、對中國本土疆界發起挑戰，引發他對甲午戰爭以來中國領土損失的深刻反思。在此脈絡下，臺灣、朝鮮與琉球遂與東北三省一同被納入其對日本侵略的整體理解架構之中，臺灣也因此進入了他的視野。

上述日記中的論述，顯示蔣在國難之際，不僅借助這些「失地」構築對個人使命的精神激勵，也藉此重構一套關於「失土與復國」的民族敘事圖譜。只是，此時蔣對臺灣的關注，尚未轉化為具體可行的戰略或政策行動，僅止於一種情感驅動的歷史意識與國族想像。

郎編，《石原莞爾選集·5》（東京：たまいらば，1986年），頁143。

¹⁷ 朱匯森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2年7至12月份》（臺北：國史館，1987年），頁384。

¹⁸ 《蔣介石日記》，1932年9月13日，國史館藏。

¹⁹ 《蔣介石日記》，1918年8月18日。日記原文為：「今次船由臺灣基隆埠經過，寸衷縈懷於昔日之歷史，大有感慨不置之狀也。」

1933年2月，日本以維持「滿洲國」治安為名，準備進軍熱河，並聲稱熱河本屬滿洲的一部分。²⁰ 此舉引發中國輿論與學界強烈反彈，學界泰斗馬相伯、章太炎²¹ 聯合發表宣言，強調東三省為中國固有領土，是中國內地而非藩屬，²² 並駁斥熱河屬滿洲之說。²³ 對於這場主權與疆界的論辯，蔣介石於日記中寫道：「倭寇之傳統政策，在併吞滿蒙，為東亞之霸主。吾黨傳統政策，乃在恢復朝鮮、臺灣等失地，以行王道於世界也。」²⁴

可以看出，此時蔣不僅在思想上勾勒出「完整中國」的疆域想像，更將中日對抗上升至「王道與霸道」之間的競爭。蔣嘗試將抗日的民族立場與「王道政治」的倫理觀念結合，使自身立場不僅具備歷史正義，也建立在道德與政治正當性的基礎上。這樣的論述方式，明顯是對自己的精神喊話，同時也透露出希望藉由承襲孫文的「王道」說，²⁵ 鞏固其身為民族領袖的信念與責任感。

進入1934年，蔣介石對臺灣的思考已不再僅止於日記中的內在獨白，²⁶ 而是進一步轉化為外部政治語言與公開訴求。值得注意的是，蔣之所以開始公開提及臺灣，並非出自政策考量或領土規劃，而是一種「政治回應」——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蔣介石對日本侵華一事日益深惡痛絕，並將一連串的領土喪失視為國恥，臺灣也在此背景下首次進入其對外的語言論述行列之中。這段時間，臺灣每一次出現在蔣的語言中，幾乎都與日本企圖進一步割裂中國領土、重新界定中

²⁰ 朱匯森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3年1至6月份》（臺北：國史館，1984年），頁160、204。

²¹ 章太炎（1869-1936），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與民族主義革命家。1907年4月，他與張繼等人在東京成立「亞洲和親會」，針對日本在東亞的擴張，主張亞洲諸民族應團結反對帝國主義。同年撰寫《中華民國解》，提出以「中華民國」為國號，並明確勾勒中華民國的疆域，主張越南、朝鮮「必當恢復」，緬甸「稍次」，而西藏、回部、蒙古則「任其去來」。《中華民國解》奠定了「中華民國」的命名與疆域想像。至於臺灣，他雖有提及，但在其認定中，臺灣與中國並非「同國同族」，而是被歸入「番」的稱呼範疇。

²² 朱匯森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3年1至6月份》，頁158。

²³ 朱匯森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3年1至6月份》，頁204。

²⁴ 《蔣介石日記》，1933年2月19日。

²⁵ 孫文曾多次向日本喊話，希望其「捨霸道而行王道」，以道義取代擴張。

²⁶ 1934年3月23日的《蔣介石日記》提到：「收復臺灣、朝鮮、恢復漢唐固有領（疆？）土，方不愧為黃帝之裔也。」

國主權範圍的軍事行動或外交挑釁密切相關。

在撫州演講前數日，日本對外發表聲明，主張其在東亞享有特殊權益與主導地位，認為凡屬中國內政，均應由日本主導，不容列強干涉。²⁷ 這種論述不僅否定中國具有獨立主權，更將中國與朝鮮、臺灣等既有殖民地並列，暗示中國應被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蔣介石對此極為不滿，遂於1934年4月23日，在撫州北路剿匪總司令部擴大紀念週上發表訓詞，公開點名臺灣。他嚴詞表示：

日本最近之聲明，即滅亡中國之公開表示，全國國民應有雪恥復興的志氣與血性——要做一個獨立國家的國民，國家由我們手裏復興起來！不僅是東四省的失地我們要收復，而且朝鮮、臺灣、琉球……這些地方都是我們舊有領土，一尺一寸都要由我們手裏收回！²⁸

在這段演說中，蔣介石不僅將臺灣、朝鮮、琉球納入「舊有領土」的復國清單，還進一步透過「一尺一寸都要由我們手裡收回」的語言，將過往在日記中反覆出現的民族恥辱與歷史痛點，轉化為一種具高度政治動員力的公開訴求。這次公開發言標誌著蔣介石首次將「臺灣」從個人精神喊話推進到集體記憶與國族話語的層面——臺灣成為一種政治符號，象徵「失地」、「國恥」與中華民族復興的目標與召喚。

1935年，日本開始積極策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同年11月初，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開始以武力威脅及政治施壓，要求華北當局宣布自治，試圖在關內複製「滿洲國」模式。11月25日，殷汝耕在河北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並以委員長身分發表自治宣言，此委員會成為日本在華北製造的第一個小型傀儡政權。12月25日，殷汝耕再將該組織改組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²⁷ 蔣中正，〈日本之聲明與吾人救國要道〉，收錄於「《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二·演講」：http://www.ccf.org.tw/cc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87:0023-3&catid=134&Itemid=256（2025年7月10日點閱）。

²⁸ 蔣中正，〈日本之聲明與吾人救國要道〉，收錄於「《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二·演講」：http://www.ccf.org.tw/cc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87:0023-3&catid=134&Itemid=256（2025年7月10日點閱）。

使冀東22個縣獨立於國民政府管治之外。²⁹

就在主權與疆域面臨新一輪侵逼的背景下，蔣遂再次在公開場合提及臺灣。1936年1月16日，他在南京勵志社向全國中等以上學校校長及學生代表發表題為「政府與人民共同救國之要道」的演說時，指出日本侵略中國並非始於九一八事變，而是早於1874年便已有圖謀，更於1895年藉由甲午戰爭將臺灣納入其版圖。同時，他再度強調「恢復高臺、鞏固中華」乃國民黨一以貫之的使命。³⁰ 此種訴求與1934年撫州演講一脈相承，顯示蔣將臺灣置入其「回應日本侵略一動員漢民族意志」的語言框架之中；當日本的擴張威脅升高之際，臺灣便更容易被放置於民族復興與國家存亡的語境之中。

換言之，此時「臺灣」在蔣的語言中已被推升至國家復興敘事的中心位置，成為動員全民的情感載體。蔣介石試圖藉此喚起全國人民「亡國」與「獨立國民」之意識，激發民眾抵抗意志與國族責任；同時也用以鞏固國民黨政權的領導正當性，讓人民相信，唯有由國民黨領導的中國，才能真正恢復民族尊嚴、收復失地並重建國家。

然而，在蔣介石心中，臺灣並不僅止於一個象徵性的「失地」。他同時清楚認知到，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已實質成為日本南進戰略中的軍事前哨與侵華跳板。因而，在他的日記中，也留下這樣的記述：「松井任大井與荒木併列，其臺灣司令官之重要與對華南之陰謀。」³¹

由此可見，蔣對臺灣的認識其實同時包含兩條平行但交錯的軸線：一方面，他將臺灣納入中國「待恢復失地」的精神地圖，作為民族復興與王道政治的象徵；另一方面，他也務實地將臺灣視為敵國據點，是日本南進華南、威脅中國主權的戰略基地。前者體現的是民族主義的疆域想像，後者則反映地緣現實的軍事

²⁹ 朱匯森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5年11至12月份》（臺北：國史館，1990年），頁325-328、651。

³⁰ 蔣中正，〈政府與人民共同救國之要道〉，收錄於「《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七·專著」：http://www.ccf.org.tw/cce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13:0007&catid=118&Itemid=256&limitstart=1（2025年11月16日點閱）。

³¹ 《蔣介石日記》，1933年10月24日。

警覺。兩者並存於蔣的日記與思想體系中，彼此交織，構成日後其臺灣政策構想的重要思想基礎。

二、失地象徵與敵方據點的並存與交錯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臺灣」再次出現在蔣介石的語言與思考之中。蔣延續他早於1933年即已建立的認知——臺灣為日本南進華南的重要軍事基地——並在戰爭全面爆發後，更具體地強化其軍事敵地的角色。同年8月，蔣在《反省錄》中記述：「侵寇在臺灣最新之重機五十架出而不返，為我擊落者四十二架。」³² 這是蔣在中日戰爭爆發後，首次在日記中提及臺灣，但非從民族語境切入，而是明確指出臺灣作為日軍基地的事實，並以「侵寇在臺灣」一語凸顯其對日本以臺灣為前進據點的戰略警覺。這一軍事行動與日記中的民族情感，構成了蔣對臺灣雙重認識下的張力，也說明戰時中國領導人對「疆界」、「民族」與「敵我」的思考，遠比單一民族主義敘事來得複雜而多層。

這樣的認知，在1938年進一步轉化為實際軍事行動的標的。當年2月，蔣於日記中明言：「我空軍本日轟炸臺灣二次。」³³ 這是中國抗戰以來首次由本國空軍對敵國海外領土發動轟炸，而目標正是臺灣。此舉不僅顯示蔣完全將臺灣視為戰略敵地，也說明在戰爭壓力下，「民族情感」已讓位於現實軍事判斷。臺灣被優先定位為敵後據點與軍事跳板，成為實際軍事攻擊的對象。臺灣至此雖再次進入蔣的現實視野，卻是以「敵國狀態的接觸」出現，而非作為民族故土的認識對象。

1938年春，蔣介石的語言重新回到民族復興的主軸，並進一步在原有「失地」概念之上，³⁴ 引入孫文所強調的「扶助弱小民族」理論。他不再僅強調臺灣

³² 蔣中正著，蕭李居編，《蔣中正日記（1937）》（臺北：國史館，2025年），頁236。

³³ 蔣中正著，陳昶安編，《蔣中正日記（1938）》（臺北：國史館，2025年），頁51。

³⁴ 中日戰爭爆發後，蔣的「失地」與「民族復興」語言，開始與當時中國學界的疆域論述相互呼應。1930年代，隨著學術體制逐漸成熟，「中國疆域」的概念也被系統化。對中國歷史地理學影響深遠、並創辦中國邊疆學會的顧頡剛及其學生史念海，於1938年出版的《中國疆域沿革史》論述自夏代以來至民國建立為止的疆域變遷。雖然書中文字未特別提及臺

是中國的領土與國恥象徵，同時也提出臺灣與朝鮮皆是帝國主義下的「被壓迫民族」的視角，將臺灣納入東亞革命的總體想像。³⁵ 這一語言的新增視角，並未取代原有的「失地」與歷史主權想像，而是進一步疊加上被殖民民族的革命敘事，強化其語言的道德與政治訴求力。

這一轉變首次出現在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演講中，並在同年11月蔣介石的日記中持續出現。在日記中，蔣寫道「東亞大革命之目的，在解放我韓國、臺灣之同胞」，³⁶ 亦提及「中國抗戰不僅為中華民族生存計，與朝鮮臺灣之同胞獨立自由之計」。³⁷ 此處的「解放」、「獨立自由」等語彙，不僅體現出他在論述上延續並轉化孫文對臺灣的「最少限度自治」的主張，同時亦顯示蔣對當時戰局的冷靜判斷：在無力實際收回臺灣的情況下，他選擇以這樣語彙作為其策略性模糊的方式，如此既延續民族訴求，也保留政治彈性與論述的空間。

1939年一整年，蔣在其日記裡只聚焦於臺灣的軍事與戰略角色，記錄了福岡與臺北煤礦被工人炸毀，³⁸ 及日本船隻停止香港與臺灣之間的航行，並推測日本可能對英國發動報復。³⁹ 這兩則日記皆未出現民族主義或歷史情感性的語彙，而是以臺灣作為敵方殖民體系中的軍需地、通訊樞紐與戰略節點來觀察，顯示此時蔣更多從戰爭總指揮的視角關注臺灣的軍事位置與交通意義。

1940年，蔣介石對臺灣的思考出現新轉變。他不再將臺灣作為地與人的整體敵方空間來看待，而是將「臺灣人」從「臺灣這塊土地」中分離出來，重新思考臺灣人在戰爭中的可能角色。4月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對敵軍宣傳時，注重

灣，但依時代所繪製的每一張地圖皆可看到臺灣。這種透過地圖的視覺再現所形成的「不證自明」，實際上自然地建構一種前提：臺灣理所當然屬於中國疆域，且無須再行論證。詳見顧頡剛、史念海，《中國疆域沿革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

³⁵ 蔣中正，〈對日抗戰與本黨前途〉，收錄於「《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五·演講」：http://www.ccf.org.tw/cce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113:0016-7&catid=143&Itemid=256（2025年8月11日點閱）。

³⁶ 蔣中正著，陳昶安編，《蔣中正日記（1938）》，頁242。

³⁷ 蔣中正著，陳昶安編，《蔣中正日記（1938）》，頁244。

³⁸ 蔣中正著，林映汝編，《蔣中正日記（1939）》（臺北：國史館，2025年），頁60。

³⁹ 蔣中正著，林映汝編，《蔣中正日記（1939）》，頁89。

東北與鮮、臺士兵為尤要」，⁴⁰ 顯示蔣開始在戰爭語境下，以正面方式提及臺灣人，並有意識地利用其民族身分，視為潛在的反日動員對象。這種調整反映出蔣原本多重認知結構中的一項擴展，即將臺灣人從被動的殖民附屬，轉化為可整合進中國抗戰動員體系的潛在主體。

另一方面，在戰爭前景未明，但蔣已感受到戰局漸露曙光、國際情勢開始向中國傾斜之際，臺灣再次成為他自我激勵、堅定信念的重要支撐。當他重讀1932年日記中所立「十年內解放朝鮮，收回臺灣、琉球」之誓時，寫下：「以天意與最近時局之發展，及上帝護佑中華，不負苦心人之意與力測之，自有可能。祇要吾人深信不惑，向天道真理勇進，未有不成之事也。」⁴¹

當然，蔣仍將臺灣定位於敵國軍事與政治架構之中，因此在他的日記中亦提及「朝鮮與臺灣各總督辭職」，並判斷此為「敵國內部矛盾益著之象也」。⁴² 這也顯示他對於日本殖民統治體系內部出現裂縫的任何跡象都格外關注，試圖從中推斷日方可能的弱化與鬆動。

1941年，蔣仍延續視臺灣作為敵軍節點的認知，在其日記中談及日本自臺灣調動兵力與艦隊南進的消息，⁴³ 顯示他對日本利用臺灣作為南進根據地的警覺依然持續。然而在同年下半年，蔣介石首度嘗試將臺灣納入中國國族地理的象徵體系。10月23日，他在日記中寫下「新五嶽」的構想，考慮以「瓊山或臺灣之新高山為南嶽」，⁴⁴ 將臺灣的自然地理納入中國傳統的山川體系之中。雖然語中仍以「或」表述，顯示蔣對是否能收復臺灣尚未完全篤定，但這段紀錄展現出蔣已開始不再只將臺灣視為失土，而是試圖把臺灣納入具體的疆域規劃中。

總體來看，從1937年到1941年底，在戰局尚未明朗的條件下，蔣的表述多為立場與方向的宣示，非具體的政策部署。他一方面持續關注臺灣作為日本南進據

⁴⁰ 蔣中正著，陳世局編，《蔣中正日記（1940）》（臺北：國史館，2025年），頁103。

⁴¹ 蔣中正著，陳世局編，《蔣中正日記（1940）》，頁263。

⁴² 蔣中正著，陳世局編，《蔣中正日記（1940）》，頁287。

⁴³ 蔣中正著，侯紀安編，《蔣中正日記（1941）》（臺北：國史館，2025年），頁140、185。

⁴⁴ 蔣中正著，侯紀安編，《蔣中正日記（1941）》，頁338。

點的戰略角色，另一方面也在語言中逐步將臺灣更深地納入「中國」的整體結構之中——不論是將臺灣人視為可動員的抗日主體，或是將臺灣地理納入中國傳統疆域想像，皆顯示出蔣對臺灣的思考已開始超越過往單一的「失地」、「敵地」定位。臺灣不再僅僅是戰略基地或國族恥辱的象徵，而是同時出現在軍事部署、被殖民民族動員與國土認知的語言脈絡中。這些語言變化並非線性推進，而是在不同局勢刺激下所產生的交錯回應，顯示蔣對臺灣的看法始終處於調整與形成的過程之中。

叁、從戰略模糊到獲得國際承認

一、外交優先與戰略保留

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對日宣戰的同時，宣告廢止一切中日間的條約與協定，這不僅意味著將臺灣割讓出去的《馬關條約》隨之失效。同時也代表，國府在法理上已具備公開宣示收復臺灣的正當性與基礎。然而，檢視1941年底至1942年4月這一時期國府的實際作為，可以清楚發現，國府並未開始「收復臺灣」的明確政策，甚至在觸及臺灣問題時，蔣介石仍採取保留態度，刻意維持處理臺灣問題上的彈性與模糊空間，未將收復臺灣列為既定國策。

最直接的證據，即來自臺灣革命同盟會於1942年春天向國民政府所提出的請願案。臺灣革命同盟會是由在中國活動的臺籍人士組成的抗日團體，致力於團結在中臺灣人的力量，爭取臺灣脫離日本統治、復歸中華民國。1942年3月下旬，該會召開第二屆會員大會，除選出李友邦、宋斐如、謝南光為常務委員外，並通過4項決議：（一）光復之第一步，在請求中央設立臺灣省政機構；（二）在該省政機構內設省黨部、在國民參政會增設臺灣參政員名額；（三）設光復軍或臺灣革命軍以作為光復臺灣之主力；（四）擴大宣傳，改正國內認為臺灣同胞是另一

民族之錯誤。⁴⁵

會後，三位常務委員聯名將前兩項決議具體化為呈請案，呈報行政院長蔣介石，正式建議設立臺灣省政府、增設臺灣參政員。⁴⁶ 同時，為擴大社會輿論支持、喚起中國社會對臺灣問題之重視，臺灣革命同盟會（在宋斐如推動下）更於重慶、與以東方文化協會⁴⁷ 為首的在渝文化團體共同舉辦了第一屆臺灣光復運動宣傳大會。會場聚集多位國民政府高層官員到場致詞表達支持，⁴⁸ 翌日重慶各大報多以專刊形式報導「臺灣光復」相關內容，形成一次高調的政治與媒體輿論宣傳。⁴⁹

這是在中臺籍人士第一次與國府官員聯合向國內發聲，展示出一場不論在政治象徵上或輿論層面上皆頗具代表性的活動。然而，這場活動不僅完全未出現在蔣介石當日或隨後的日記中，同一時期，蔣對同盟會呈請案的正式回應亦顯得相當冷淡——大約一個月後，他批示設省案「緩議」，參政員案則「暫時無需討論」。⁵⁰ 這種消極態度反映出，蔣在此階段對於臺灣定位採取觀望與保留的態度，而非將收復臺灣一事視為國府的明確國策。

這種對臺灣定位的策略性模糊，源自蔣介石對國際戰略格局的現實考量。因為當時蔣的核心策略在於爭取國際支持與盟國認可，以確保中國戰場能取得最終勝利。1941年底至1942年初，蔣介石的首要目標，是爭取美國積極介入亞洲戰場，將對日作戰列為優先事項。因此，處理臺灣問題時，蔣非單純出於民族情感

⁴⁵ 張瑞成編，《臺籍志士在祖國的復臺努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90年），頁123-124。

⁴⁶ 〈宋斐如等建議設立臺灣省政府增設參政員及治臺意見（1942年4月-1947年6月）〉（1942年4月13日），收入陳雲林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12》（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頁349-353。

⁴⁷ 東方文化協會會長為監察院長于右任、副會長為司法院副院長覃振。

⁴⁸ 覃振、章淵若、司徒德、黃少谷及立法院長孫科皆發表演說，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到場表達支持。

⁴⁹ 呂芳上，〈臺灣革命同盟會與臺灣光復運動（1940-1945）〉，收入氏著，《民國史論（下冊）》（臺北：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1231-1232。

⁵⁰ 「宋斐如等建議設立臺灣省政府增設參政員及治臺意見（1942年4月-1947年6月）」（1942年4月13日），收入陳雲林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12》，頁354-363。

或「失地」訴求，而是刻意為日後與美國談判預留最大的彈性空間。正因如此，臺灣問題在此階段被刻意置於戰略模糊地帶，國民政府不主動提出「收復」主張，藉以避免損及美國的支持與戰略合作之可能性。蔣介石的這種操作，充分展現其現實主義策略——將外交與大國協調優先於民族情感或歷史正義之上。

此種模糊臺灣定位的想法，也反應在蔣介石這時期的日記之中。1942年1月24日，蔣於反省錄中記述：「……然越南、臺灣本皆非國外，為我藩耳。」⁵¹ 此語顯示，蔣將臺灣與越南並列，雖不致認為二者是「國外」，但卻將臺灣視為「藩」，而非中國本土。顯示蔣此時把臺灣降置於一種類似傳統中國藩屬地帶的曖昧地位，而非一直以來強調的「失地」、「故土」。在此階段，臺灣在蔣思考中不再是必然需要收復的「國恥」象徵，而是一個尚未定義、地位浮動的存在。

綜言之，在對日宣戰的前半年，蔣介石至少在決策上未將臺灣視為堅定必收復之失地，而是將其定位成國際戰略與外交談判的籌碼。這反應出此時的蔣介石以為中國博取最大利益的前提下，在面對臺灣問題時，更多地是希望藉此爭取到盟國的支持，而非民族主義驅動下的「失地復歸」。是故，臺灣在這一時期，與其說是國府必爭之地，不如說是蔣介石權衡大國關係下的一枚棋子。

二、美國因素與共同防禦構想的提出

進入1942年下半年，蔣介石對臺灣問題的態度出現明顯轉折。相較於上半年刻意維持模糊，此時蔣不僅在日記中，甚至以政府立場，逐步公開收復臺灣的主張，並將此議題納入對外政策核心。這一變化的根本原因在於戰局與國際情勢的變化——一方面，蔣切身感受到美國開始在實質上支持中國；另一方面，也意識到在美國的戰後構想中，有意將臺灣置於美國主導的安全體系之中。特別是在1942年6月中途島戰役成為太平洋戰局的重大轉折後，日本的海上優勢首次遭到重創，戰敗前景開始浮現，美國國務院也隨即開始研究日本殖民地的戰後處理問題，臺灣的未來也隨之進入美國官方的戰後規劃視野。這種國際環境的變化，不

⁵¹ 蔣中正著，廖文碩編，《蔣中正日記（1942）》（臺北：國史館，2025年），頁47。

僅加深了蔣介石對臺灣戰略地位的警覺，也讓他逐漸覺得「收復臺灣」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口號，而是可以隨戰局推進實現的目標。同時，他也愈發清楚臺灣在太平洋戰略格局中的重要性，尤其對美國而言，臺灣正處於西太平洋第一安全島鏈的樞紐位置，是銜接東亞與東南亞的戰略門戶。

與此同時，美國著名的《幸福》⁵²、《時代》、《生活》三大雜誌的編輯，亦在戰時共同組織了一個研究戰後和平方案問題的委員會，並起草《太平洋關係備忘錄》，其內容刊登於1942年8月號《幸福》雜誌。備忘錄第四章提出一項戰後防禦構想：自夏威夷起，經中途島、威克島、關島、琉球、小笠原直抵臺灣，建構出一條「橫越太平洋的公路」式安全島鏈。文中更直言，臺灣不僅將成為「聯合國空軍與空中艦隊的重要停靠站」，更是「最強大的西部根據地」，而該防禦線範圍內的一切據點皆應由國際委員會共同經營。⁵³ 雖然蔣在當時的日記中未留下相關紀錄，但這並不意味他毫不關心，從其10月的行動與發言即可看出，他對此早已做出深思熟慮的回應。

1942年8月22日，羅斯福致函蔣介石，表示將派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Wendell Willkie）訪問中國，並希望與蔣及宋美齡會晤，交換兩國對重大問題的看法。⁵⁴ 對此，蔣於10月6日的日記中，預先記下次日會晤威爾基時的談話要點，明確指出：「旅順、大連、臺灣必須歸還中國」，並提出各軍港「允予中、美共同建設與使用」，以實現中美兩國「共同防禦之理想」。⁵⁵ 此時的蔣，不僅明確將臺灣定位為中國「必須收回」的領土，且不再與朝鮮並列，而是與東三省等「失土」並陳，同時在戰略層面首次具體提出「共同防禦」構想。

翌日早餐會談中，蔣進一步闡述：若旅順、大連與臺灣由中美共同維持海軍根據地，戰後日本即使仍有再度侵略之圖，必將有所顧忌；此防禦體系還可與菲

⁵² 《幸福》為戰時中國報刊對*Fortune*雜誌之通用譯名，如《中央日報》與《大公報》（重慶）均採此稱。本文為忠實呈現當時語境而沿用「幸福」一詞，惟今日中文世界之通行譯名則為《財星》雜誌。

⁵³ 〈美國輿論界主張 建立民主的太平洋 大雜誌合擬之備忘錄全文（五）〉，《中央日報》，重慶，1942年11月13日，版3。

⁵⁴ 郭存孝，〈抗戰時期美國特使威爾基訪華記〉，《中外雜誌》，1942年10月，頁80。

⁵⁵ 蔣中正著，廖文碩編，《蔣中正日記（1942）》，頁290。

律賓海軍力量串聯，形成對日本三島的包圍之勢。蔣又指出，若西太平洋不能因中美合作而穩定，東太平洋的安全同樣會受到衝擊，因此美國理應與中國加強合作。⁵⁶ 這番表述蘊含了雙重意圖：一方面，他擔憂日本戰敗後可能捲土重來，威脅中國的長遠安全；另一方面，他刻意凸顯中國在西太平洋防禦體系中的不可替代價值，藉此讓美國意識到中國的重要性，並促使其在安排戰後秩序中支持中國收復臺灣的政策；蔣所提出的「共同防禦」論述，不僅回應了盟國戰後集體安全體系的討論，更直接呼應了美國防禦帶構想的核心訴求——他試圖透過此安排，一方面爭取美國在安全戰略上的認同與支持，另一方面也爭取美國明確承認臺灣戰後必須回歸中國。

1942年11月3日，外交部長宋子文於重慶國際宣傳處記者招待會上，公開明確宣示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臺灣及琉球，並強調朝鮮必須獨立。⁵⁷ 這是國民政府第一次在國際場合提出臺灣收復的立場，顯示臺灣問題自此不再僅僅停留於《蔣介石日記》或內部討論的層次，而是徹底脫離先前的戰略模糊、進入了外交宣示與國際輿論的視野，尤其成為與美國之間談判與協商的核心議題之一。

11月9日，蔣在日記中的「對美事項」進一步具體化了這一立場。他條列寫下：「甲、長期同盟。乙、東三省與旅順、大連完全歸還中國。丙、臺灣、琉球交還中國。丁、要港海空軍基地共同設備。」⁵⁸ 這不僅呼應了宋子文在國際場合的公開表態，且鞏固了蔣在與美談判時爭取臺灣歸還的立場，更首次將臺灣與琉球並列，顯示其戰略思維的調整——意識到臺灣與琉球同為美國西太平洋戰略帶的重要節點。與此同時，他再次強調願意與美國共同使用軍港，以換取美方的認同與支持。由此可見，蔣在政策與外交雙重層面上，已將「收復臺灣」視為既定目標，並積極透過安全合作爭取國際承認，以提升中國在戰後談判中的籌碼地位。

⁵⁶ 「蔣中正與威爾基談話紀錄：通貨膨脹問題及對戰後穩定太平洋局勢意見」（1942年10月7日），〈革命文獻——對美外交：威爾基訪華〉，《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36-021。

⁵⁷ 張瑞成編，《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90年），頁4。

⁵⁸ 蔣中正著，廖文碩編，《蔣中正日記（1942）》，頁321。

總結而言，1942年下半年，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對臺灣政策的轉變，關鍵並不在於一貫的民族主義意志，而是在於對國際格局、特別是美國戰略意圖的判斷與回應。正是在外部條件漸趨有利之際，國府才選擇將臺灣收復主張正式提升為明確政策，並作為中國爭取美國支持的主要外交籌碼。蔣介石對臺灣的認知，已從過去的「民族解放」、「失土回歸」，明確轉變為「戰略國土」、「談判籌碼」。可以說，1942年下半年才是國府臺灣政策的歷史性關鍵轉折點，這一政策的生成與轉向，是基於國際現實主義的考量，而非民族敘事的產物。

三、行政籌劃與開羅宣言

1942年下半年，蔣介石在確認收復臺灣的意向並認識到其戰略地位後，1943年的臺灣政策進入新階段——從戰略構想走向實際操作，既著手行政籌備，也積極推動國際承認。

8月25日，蔣在日記中反思先前主動向美國提出，戰後臺灣與旅順的海空軍基地可由中美共同使用一事。蔣雖承認此舉時機或許過早，易使美國認為可對中國「有所挾制」，但他亦擔心若不先表態，美國更可能懷疑中國別有野心而不予信任。更重要的是，他認為此舉可提前將美國綁入中國主權與太平洋安全的共同架構中，避免美、英、蘇另謀共管臺灣與東北的可能性。蔣強調，這是為了讓美國在太平洋西岸安全設計上感到安心，進而支持中國的領土主張。最後，他以「只要與美有期限協定或共同聲明，使臺灣最終主權歸屬中國，短期共用並非不可接受」作結。⁵⁹ 此篇日記充分體現展現出蔣介石在面對臺灣問題時，願意以有限讓步換取關鍵的國際承認。

然而，蔣對美國的信任並非毫無保留。當羅斯福在公開發言中雖提到「中國所有被日本侵奪之土地皆應歸還中國」，卻未明確點名「臺灣」時，蔣不僅認為美方對中國戰區的重視程度依然不足，更因此感到不踏實。⁶⁰ 蔣介石深知，收復臺灣的政策要真正落實，必須仰賴美國的明確支持與背書；僅有原則性的「所有

⁵⁹ 蔣中正著，陳頌閔編，《蔣中正日記（1943）》（臺北：國史館，2025年），頁221。

⁶⁰ 蔣中正著，陳頌閔編，《蔣中正日記（1943）》，頁245。

失地」承諾，難以防止戰後臺灣在國際談判中被模糊化或納入其他安排。因此，蔣雖不完全信任美國，但也不得不承認今後仍需透過持續的外交談判與策略協調，爭取美國在戰後安排中具名承認臺灣，才能確保其歸屬中國。

儘管尚未完全確定美國是否會支持臺灣歸屬中國一事，蔣仍積極推動臺灣進入國民政府的行政籌備計劃之中。在10月的「本月大事預定表」，他明確列出「收復東北與臺灣之準備工作」，顯示其主觀認知已進入「實際接收與統治準備」的初步階段。10月3日與24日的「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中，更將「收復東北與臺灣之準備與人選」具體化，並在24日的日記中明確點名陳儀、王世杰、鄒魯、湯恩伯為接收候選人選。這是臺灣首度被納入國府高層的具體行政安排，顯示政策已不僅停留於構想層面，而是實質進入戰後治理的前置規劃。

蔣介石自重慶飛往開羅當天，在日記中為即將召開的會議擬定議題時，將「東北與臺灣應歸還中國」與「朝鮮獨立」皆列為應注意的最大問題，但二者被分別處理。⁶¹ 這顯示，經過1942年下半年政策轉向後，蔣已堅定將臺灣定位為中國失地，需恢復其主權，而韓國則被歸為民族自決的國際議題，琉球則不在此次主要會談目標之列。⁶²

在開羅會議正式談判過程中，蔣明確主張「東北四省與臺灣、澎湖群島皆應歸還中國」，而琉球問題則在美國羅斯福總統的追問下，蔣以可由國際機構委託

⁶¹ 蔣中正著，陳頌閔編，《蔣中正日記（1943）》，頁299。

⁶² 琉球未列入此次會談主要目標，並非意味蔣介石不重視琉球問題。早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國防最高委員會內設置的「國際問題討論會」，即於1942年1月所舉行的第五次會議中，將戰後琉球處置列入議程，並經熱烈討論後形成「劃歸日本但實施非軍事化，並尊重其特殊性」的初步意見。此考量主要在於難以否認日本對琉球的既有主權，且須兼顧英美意向。而在蔣介石前往開羅赴會的兩個半月前（1943年9月2日），國際問題討論會第三十五次會議中，針對琉球地位問題進一步提出3案：劃歸日本但不得設防、歸還中國、或置於國際共管；第三十六次會議（9月30日舉辦）對琉球問題進行複議時，傾向以「歸隸中國」為主案，並以「國際管理」或「非武裝區」作為備案。然而即使經過多番討論，國府內部對琉球地位仍未形成一致共識。開羅會議前夕，蔣於其11月15日日記中明確寫下：「此次提案對於琉球問題決定不提」，理由是琉球曾為一王國，其地位與朝鮮相似，與臺灣並不相同。詳請參見：林泉忠，〈開羅會議中的琉球問題：從「琉球條款」到「中美共管」政策之過程〉，《亞太研究論壇》，第64期（2017年6月），頁57-92；蔣中正著，陳頌閔編，《蔣中正日記（1943）》，頁298。

中美共管答之。他在日記中記下自己提出此方案的3項理由：一，以安美國之心；二，琉球在甲午戰爭以前已屬日本；三，以此區由美國共管，比歸我專有為妥也。⁶³

就在以為臺灣歸屬問題已確定之時，會議公報定稿過程中，卻發生激烈爭辯。英國代表賈德幹（Alexander Cadogan）堅持，將東北、臺灣與澎湖群島「當然應歸還中國」的表述改為「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並試圖刪減「朝鮮獨立」的內容，僅改成「使朝鮮脫離日本之統治」。⁶⁴ 這種語言策略，目的為保留戰後對臺灣主權進行國際再分配或託管的可能。若能讓臺灣僅被定義為「日本放棄的領土」，而非「歸還中國」，在法律與外交上便留下了可以被重新安排的空間，進而可以國際託管、分區管理或其他政治架構處理臺灣問題。

最終，在王寵惠的力爭與美國代表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的支持下，「歸還中國」的表述得以保留並寫入《開羅宣言》。這場角力不僅突顯出臺灣主權並非自然而然獲得國際承認，而是中美共同對抗英國模糊化策略，在外交博弈中爭取到的結果，同時也揭示英國對臺灣主權歸屬的重視。

11月28日，蔣在日記的反省錄中將《開羅宣言》形容為「中外古今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並自評是自己「登上外交舞台的第一幕」，以政治收穫為最重要的成果，認為已獲得相當成就，並相信「日後必有優美之效果」。⁶⁵ 此一自評顯示，他不僅將開羅會議看作是生涯至今最突出的外交成果，更視之為一個新的起點，期待未來能持續帶領中國走向更輝煌的道路。

在年底的反省錄中，蔣進一步將此成果與美國國會廢除《排華法案》並列，認為「百年來所受之國恥與污辱，已一筆勾消，掃除盡淨」。但他同時警覺到，真正的平等與獨立仍需「二十年內加倍努力與奮鬥」才能鞏固。⁶⁶ 這種榮耀與危機並存的心態，反映出蔣在感到榮耀之餘，依然懷抱深刻的國族危機意識。

⁶³ 蔣中正著，陳頌閔編，《蔣中正日記（1943）》，頁303。

⁶⁴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7冊（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505。

⁶⁵ 蔣中正著，陳頌閔編，《蔣中正日記（1943）》，頁307。

⁶⁶ 蔣中正著，陳頌閔編，《蔣中正日記（1943）》，頁352。

總之，蔣將個人成就與國族命運緊密相扣，因此臺灣的收復在他眼中，不僅象徵國家主權的恢復，更被他視為足以奠定其「民族領袖」地位的歷史性功業。

肆、戰後接收政策的形成與部署

一、人事布局與接收準備的啟動

隨著開羅會議的落幕，《開羅宣言》將「臺灣與澎湖歸還中華民國」的主張明文列入，這在蔣介石的認知中，意味著臺灣戰後歸屬已獲得同盟國的明確背書。這一外交成果，使蔣將臺灣問題處理的重點，從外部爭取轉向內部籌劃。1944年，他開始著手思考接收臺灣的實際安排，包括確定主管人選、成立專責機構，以及設立基層治理的訓練班，逐步推進戰後接收的準備工作。

3月初，蔣介石在日記中明確寫下臺灣主管人選為陳儀，⁶⁷ 意味著早於戰爭結束一年多前，他已決定戰後由陳擔任主要負責接收與治理臺灣之人，且這一決定在戰後的正式接收前後始終未曾更動。

回顧蔣介石1943年的日記，他曾列出陳儀、王世杰、鄒魯與湯恩伯4人，作為接收東北與臺灣的主要候選人。這份名單最終僅有陳儀一人真正落實於接收臺灣的實際人事安排——在戰時籌備階段，他被指定出任1944年4月17日成立的「臺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戰後，出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相較之下，東北接收人事不僅與蔣最初構想的人選不符，且在幾經更動後方確定由熊式輝出任東北行營主任。⁶⁸ 陳儀自始至終維持接收臺灣的核心位置，既反映蔣介石

⁶⁷ 蔣中正著，張世瑛編，《蔣中正日記（1944）》（臺北：國史館，2025年），頁80。

⁶⁸ 熊式輝在其回憶錄及日記中皆提及，1944年間原預定由沈鴻烈出任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本人在獲蔣介石徵詢時亦多次推薦沈鴻烈，認為其最適合該職，只要蔣介石能給予信任。然而最終人事因宋子文反對而改由熊式輝接任。無論如何，沈鴻烈與熊式輝兩人均未出現在蔣介石1943年最初構思的接收人選名單中。參閱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10年），頁293-294；《熊式輝日記》，1944

對其的高度信任，也顯示臺灣接收的人事安排並未如東北般受到國府高層人士的挑戰或牽制。

此外，陳儀對臺灣接收與治理的構想，與蔣介石對戰後臺灣的整體思路大體一致，推測亦是其得以長期穩定居於此位的重要原因。當臺灣調查委員會向蔣提交《臺灣接管計畫綱要草案》，主張戰後中央應賦予臺灣行政組織較大自主空間時，蔣並未視此為削弱中央統治權的企圖，反而予以同意。由此可見，兩人的治臺構想在原則與方向上具有高度契合。筆者認為，這也使陳儀在1945年正式接收臺灣時所獲得的權限與裁量空間相對集中與穩固，使其能以高度自主的姿態規劃並主導戰後臺灣的行政重建與治理方向。

10月，美軍發動對臺灣的大規模空襲與海戰。12日起，美軍對臺灣進行轟炸，月底更在菲律賓、琉球、臺灣東南海面與日軍激烈交戰。⁶⁹ 這場行動不僅是盟軍進攻戰略的一部分，也證實了蔣介石長期以來「臺灣為敵軍戰略堡壘」的判斷。更重要的是，蔣透過這一系列軍事行動，得以在具體戰局中見到臺灣作為西太平洋制海權與制空權爭奪核心的現實意義：一旦掌握臺灣，即可控制東亞與太平洋的戰略門戶。在蔣的理解中，美軍的大規模攻擊顯示美國對臺灣戰略地位的評估與自己高度契合，並印證了1942年《幸福》雜誌等美方戰後安全構想中所強調的臺灣關鍵地位。是故，臺灣在蔣的戰後構想中，不僅是必須收回的領土，更偏向視其為確保國家安全與國際地位的關鍵樞紐。

同月，國府的接收準備也擴展至基層治理層面。依臺灣調查委員會的規劃，戰後接收人員的培訓分為3類：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臺灣警察幹部講習班，以及銀行調訓班。⁷⁰ 其中最早開課的是臺灣警察幹部講習班，顯示國府在接收順序上的優先考量並非行政運作，而是社會秩序的穩定。這種安排反映出國府對戰後臺灣局勢的潛在不安——臺灣長期處於日治之下，無法確定接收初期是否會出現激烈的社會反抗或治安失序。因此，在展開正式治理之前，必須先建立一支能迅速

年3月9日、27日，哥倫比亞大學藏。

⁶⁹ 蔣中正著，張世瑛編，《蔣中正日記（1944）》，頁271、272、282。

⁷⁰ 鄭梓，《戰後臺灣的接收與重建——臺灣現代研究論集》，頁54-56。

投入維持秩序的警政力量，以確保接收工作的順利推進。

10月28日，蔣親赴中央警官學校臺灣警察幹部講習班開學典禮並發表訓話，強調未來派往臺灣的警察必須「仁民愛物」，讓臺灣人民「懷德感恩」，才能完成建國工作。⁷¹ 蔣的親自出席，不僅顯示他對該講習班的重視，也可能反映出他對接收後臺灣社會秩序能否維持穩定的關切。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高層還是基層的人事安排上，蔣介石的用人特徵始終以中國本土人士為核心。戰後接收臺灣的最高主管陳儀，以及主持警察幹部講習班的胡福相，皆非臺灣人——前者是蔣的親信，後者則與陳儀同為浙江籍，並曾是陳儀福建省長任內的班底。意即，在當時的治理構想中，臺灣主要權力核心應由中央直接指派完全信任的人士掌握，未曾考慮任用臺灣本地菁英擔任主要領導職務。即便在警察班等基層訓練層面，也僅在特定情況下吸收臺籍人士，且這些人必須具備在中國本土活動的經驗，才能進入接收體系。⁷² 這種「中央直派、外來班底」為核心的人事布局，預示了戰後接收臺灣的治理模式將以中央集權、排斥本地參與的方式進行。

二、民族情感落差與戰略定位

進入1945年，距離日本投降僅剩數月，從九一八事變發生、臺灣進入蔣介石視野以來，首次有臺籍人士的名字出現在蔣介石日記中——「宋端華臺灣人，馮介紹」。⁷³ 宋端華即宋斐如（本名），曾在1942年主導對中國國內的「臺灣光復」宣傳運動，並擔任臺灣調查委員會專任專門委員、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民政組導師。然而，蔣在日記中記下他的原因，是因馮玉祥的介紹認識，而馮之所以推薦宋，則是因宋曾在察哈爾抗日時期為其部屬授課，被視為知日臺籍人士。

⁷¹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7冊，頁565。

⁷² 中央警官學校在重慶成立臺灣警察幹部講習班，以胡福相為班主任，選調重慶附近之閩、粵、臺籍警官受訓。參見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7冊，頁565。

⁷³ 蔣中正著，吳淑鳳編，《蔣中正日記（1945）》（臺北：國史館，2025年），頁92。

一個月之後，宋斐如的名字再次出現在蔣介石的日記中，此次寫的是「黃朝琴、宋端華可派臺灣工作」。⁷⁴ 黃朝琴在美國取得碩士學位後，即進入外交部工作，1942年在中央訓練團高級班撰寫〈臺灣收復後之設計〉，主張將臺灣設置為「實驗省」。該論文在臺灣調查委員會成立不久後出版成冊，送交陳儀。陳儀對於黃朝琴所提出之收復計畫十分讚賞。⁷⁵ 而此計畫的綱要輾轉送至蔣介石處，蔣介石閱讀後批示「其所陳各點不無見地」，並要求臺灣調查委員會擬辦參考。⁷⁶ 這或許是蔣對黃朝琴留下印象的原因。

然而，即使被蔣介石「欽點」，且早已在中國工作多年、具備內地行政與政治經驗，兩人在體系中的地位與影響力，仍遠不及陳儀及其長年隨行的班底，更無法跟那些與中央高層關係深厚的外省菁英相比。戰後宋斐如出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是臺籍人士在行政長官公署中的最高職位，但與外省高層相比，不僅層級偏低，且缺乏實權；黃朝琴則先出任臺北市長，日後再因陳儀的「協助」成為臺灣省參議會議長，取代原本眾望所歸的臺灣士紳林獻堂。只是，其實臺灣省參議會是個諮詢並無實權的機關。

此外，蔣介石亦親自主持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的結業典禮。⁷⁷ 該班是臺灣調查委員會規劃的三大訓練班之一，歷時近4個月，課程重點在於熟悉日治時期的法令制度與接管措施，屬於行政系統的核心培訓。加上蔣先前曾出席警察幹部講習班的開學典禮，三大訓練班中已有兩個由他親自參與，且分別對應到日後治理臺灣的治安與行政兩大支柱。這不僅顯示出蔣對戰後臺灣治理的高度重視，也反映出他對「外來治理班底」的親自栽培與掌控，以確保接收團隊的忠誠與可控性。

日本投降不到兩週，蔣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與國防最高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發表題為「完成民族主義維護國際和平」的演講，提出「恢復我臺灣及澎湖的失

⁷⁴ 蔣中正著，吳淑鳳編，《蔣中正日記（1945）》，頁117。

⁷⁵ 〈臺灣調查委員會收集之臺情報資料暨該會為收集臺灣問題資料與各機關團體及個人來往文件〉，收入陳雲林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21》，頁61-69。

⁷⁶ 〈軍委會為臺灣收回後的設計綱要與中央設計局來往函電〉，收入陳雲林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23》，頁329-331。

⁷⁷ 蔣中正著，吳淑鳳編，《蔣中正日記（1945）》，頁124。

土」與「恢復東三省」「恢復朝鮮獨立」為國民革命的最大目標與工作之一。⁷⁸ 這種以民族主義的語言表現出祖國對臺灣的關心，為戰後臺灣的統治合法性及正當性提供了象徵基礎，也塑造出國民政府自始至終心懷臺灣的形象，並成為日後官方對「為何必須收復臺灣」的統一解釋。然而，從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多次政策轉折與現實權衡來看，這種「始終如一」的民族主義說法，充其量只是一種政治敘事，而非完整的政策全貌。

就在蔣介石積極對外塑造「祖國始終牽掛臺灣同胞」的形象時，來自臺灣的第一手回報卻令他意外。1945年9月7日，蔣召見空軍第一路司令官張廷孟，⁷⁹ 交付其「對日軍之方針與旨意」。⁸⁰ 從任務內容可知，張廷孟此行原本著重於掌握臺灣地區日軍部署與投降狀況，而非觀察民情。然而，9月20日，蔣在日記中寫下張廷孟返報內容，指出各地「男女老幼一睹歸還祖國懷抱事實，其熱烈情緒，悲喜交集不可名狀」。顯然，張廷孟在現地意外接觸到臺灣民眾強烈的情感反應，讓其留下深刻印象，並意識到臺灣社會展現出的熱烈情感，顯然不僅是對政治說辭的回應，更像是一種真切存在、長久積累的民族情感，因此把臺灣民眾對歸還祖國的熱情向蔣回報。蔣也在日記中寫下「唯此乃得一慰也」之感想。⁸¹

這份安慰之所以帶有強烈的意外性，正因蔣先前假定接收初期可能面臨社會反抗與秩序動盪，並因此在戰時優先強化警政與治安體系。然而，臺灣社會的實際反應卻遠較其預期順從且正面。這份驚訝甚至延續至1946年底——蔣在當年的總反省中仍坦言：「當初以為臺灣降俘約有五十萬之眾，恐生他變，不易收拾，

⁷⁸ 蔣中正，〈完成民族主義維護國際和平〉，收錄於「《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一·演講」：http://www.ccf.org.tw/ccfd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26:0025-11&catid=154&Itemid=256（2025年9月2日點閱）。

⁷⁹ 張廷孟，1925年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1931年出任空軍第一大隊隊長、第四大隊隊長，1941年升任空軍總指揮部參謀長，自1943年起任空軍第一路司令官。在臺灣接收前夕，張廷孟似曾多次往返臺灣。根據當時臺北出版之《民報》報導，1945年10月22日下午2時20分，張廷孟由南京搭乘專機抵達臺北，隨行者包括參謀趙廷珍、黃龍金及秘書蔣一奎等人。推測當時張廷孟應為蔣介石在處理接收臺灣一事上倚重的重要軍事代表。參見〈張廷孟將軍由京來臺〉，《民報》，臺北，1945年10月25日，版2。

⁸⁰ 蔣中正著，吳淑鳳編，《蔣中正日記（1945）》，頁260。

⁸¹ 蔣中正著，吳淑鳳編，《蔣中正日記（1945）》，頁269。

最後亦卒告無事，安全收回。」⁸² 顯示這場接收的順利與臺灣社會的高度配合，至一年半後仍使蔣心中保有深刻且超出預期的震撼。

然而，這份由臺灣民眾真切情感所帶來的震撼，並未改變蔣介石看待臺灣的根本視角。蔣對這份熱情的回應，並未轉向理解或回應臺灣社會的需求，而是再次回到冷靜的戰略思維。10月，他將臺灣與海南並列為「將來國防資源與軍事工業、海空軍之基地」，稱兩島收復是「對北國防唯一之定力」，並強調應積極經營與設施。⁸³ 意即對蔣而言，臺灣的價值，最終並非因民族情感而不可或缺的「中國的一部分」，而在於它作為「大中國」整體安全戰略縱深中的一環。

伍、結論

本研究旨在透過分析蔣介石1932-1945年間的日記，探究其對臺灣認識的轉變過程及背後的推動機制，旨在解構官方敘事中「臺灣為中國固有領土」的主張，以及既有研究所建構的「國民政府始終堅持收復臺灣」的單一路徑民族主義史觀。研究結果顯示，蔣介石的臺灣觀是一套隨戰局與國際局勢動態調整的複合性敘事，其核心始終圍繞土地、戰略與國格，而對生活在臺灣的人民及其需求則缺乏實質關注。

1932年起，臺灣首次以甲午戰爭以來的「失地」與「國恥」象徵進入蔣介石的認識範疇。至1934年時，他將臺灣視為日本南進華南的軍事前哨，顯示「民族象徵」與「戰略據點」兩條主軸已初步形成且並存。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這種雙重定位在蔣的語言與政策構想中進一步強化：臺灣既被納入民族復興的象徵體系，亦被視為日軍侵華的前進基地。在戰爭初期，他甚至下令轟炸臺灣，反映出在民族情感與戰略判斷之間，後者占據了優先地位。

⁸² 蔣中正著，林本原編，《蔣中正日記（1946）》（臺北：國史館，2025年），頁335。

⁸³ 蔣中正著，吳淑鳳編，《蔣中正日記（1945）》（臺北：國史館，2025年），頁292、299、307-308。

1941年底，國民政府在對日宣戰的同時，宣布廢止中日之間一切條約與協定，包括割讓臺灣的《馬關條約》，在法理上確立中國恢復對臺灣主權的正當性。然而，在隨後數月間，蔣介石在臺灣問題上仍刻意維持戰略模糊，並未將「收復臺灣」納入明確的國策。其主要考量在於保留與美國外交協調的最大談判空間，以便為中國爭取更有利的國際地位與支持。這顯示蔣在此一階段更重視外交與大國協調，而非其公開宣稱的民族情感。

1942年下半年，隨著戰局出現轉折及中美關係的深化，蔣介石注意到美國在戰後亞太安全構想中將臺灣視為防禦體系的重要節點，因而確立起臺灣戰後必須歸屬中國的立場。蔣亦清楚意識到，臺灣的歸屬並非由中國單方面即可決定，必須獲得美國的支持，因此認為有必要及早向美國明確表達並爭取認同，遂以「共同防禦」的戰略構想作為外交包裝。

1943年的開羅會議，是蔣介石將臺灣問題由抽象的國策目標，轉化為實際外交談判與主權爭取的關鍵時刻。對蔣而言，為獲取美方對中國收復臺灣的支持，其在會議中的整體談判策略採「避免與美國利益衝突、爭取美方背書」為原則。正是在此考量下，當羅斯福詢問戰後琉球應如何處置，乃至直接詢問中國是否意欲接受琉球時，蔣以「中美共管」作為回應。此一立場並非源於蔣對琉球問題的冷淡，而是出於維護中美合作氣氛、以確保美國在臺灣主權議題上給予最大支持的外交權衡。然而，在會議公報的定稿過程中，英國代表卻主張保留戰後重新安排臺灣主權的可能性。最終雖在美國的協助下，「歸還中國」仍得以寫入宣言，但英方對中國是否應擁有臺灣主權一事刻意保留模糊的空間，凸顯出強權對臺灣歸屬的高度關注及對東亞權力平衡的考量。

自1944年初，蔣介石開始規劃戰後接收臺灣的行政與治安部署，並在高層人事上鎖定與其政治理念相近的親信陳儀主導接收與治理。除了在日記中偶爾提及長期於中國本土活動的臺籍菁英宋斐如與黃朝琴外，蔣並未規劃廣泛吸納臺灣地方領袖，也未曾考慮將行政要職交由在地精英出任。這種自上而下的領導思維，使臺灣人民處於被動地位，更顯示蔣對臺灣的治理概念中缺乏民主參與意識及提拔本地菁英回應地方需求之考量。這樣的統治構想剛好與臺灣社會經過日本統治50年，孕育出極力追求的自治理念形成鮮明對比。

1945年日本投降後，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常會與國防最高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宣示「恢復臺灣與澎湖」始終是國民革命的重要目標之一，藉此以民族主義為核心構築政治語言，強調收復臺灣的一貫性與正當性。然而，正如本文所分析，這種民族語言更多是自我激勵或鞏固政權的敘事，而非推動收復臺灣的唯一動力。與此相對，臺灣社會在接收過程中展現出的民族情感則發自真誠，並具體呈現在對「回歸祖國」的熱烈反應與高度配合。這種「真實情感」與「政治語言」之間的落差，蔣並非未曾察覺，但在面對臺灣未來的構想時，他依然優先從戰略與國家安全角度出發，而非以增進臺灣人民福祉為核心。也因此，臺灣未被視為是一個需獨立考量其特殊歷史經驗的區域，而是被放置於其「大中國」疆域構想與國防安全體系之中加以定位的「一省」。

綜言之，蔣介石對臺灣的認識始終沿著兩條交錯的軸線展開：一是以「收復失地與雪恥復國」為核心的民族——歷史——主權敘事；另一是將臺灣視為軍事要塞、國防前線與國際博弈樞紐的現實戰略考量。這兩條主軸在不同時期此消彼長，反映出蔣在民族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動態平衡，也構成了戰時乃至戰後國府對臺政策的底色。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熊式輝日記》（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革命文獻——對美外交：威爾基訪華〉。
《蔣介石日記》（臺北，國史館藏）

二、史料彙編

- 玉井禮一郎編，《石原莞爾選集·5》。東京：たまいらぼ，1986年。
朱匯森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2年7至12月份》。臺北：國史館，1987年。
朱匯森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3年1至6月份》。臺北：國史館，1984年。
朱匯森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5年11至12月份》。臺北：國史館，1990年。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7冊。臺北：國史館，2015年。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
張瑞成編，《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90年。
張瑞成編，《臺籍志士在祖國的復臺努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90年。
陳雲林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12》。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
陳雲林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21》。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
陳雲林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23》。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
蔣中正著，蕭李居編，《蔣中正日記（1937）》。臺北：國史館，2025年。
蔣中正著，陳昶安編，《蔣中正日記（1938）》。臺北：國史館，2025年。
蔣中正著，林映汝編，《蔣中正日記（1939）》。臺北：國史館，2025年。

- 蔣中正著，陳世局編，《蔣中正日記（1940）》。臺北：國史館，2025年。
蔣中正著，侯紀安編，《蔣中正日記（1941）》。臺北：國史館，2025年。
蔣中正著，廖文碩編，《蔣中正日記（1942）》。臺北：國史館，2025年。
蔣中正著，陳頌閔編，《蔣中正日記（1943）》。臺北：國史館，2025年。
蔣中正著，張世瑛編，《蔣中正日記（1944）》。臺北：國史館，2025年。
蔣中正著，吳淑鳳編，《蔣中正日記（1945）》。臺北：國史館，2025年。
蔣中正著，林本原編，《蔣中正日記（1946）》。臺北：國史館，2025年。

三、雜誌、報紙

- 《中外雜誌》，重慶，1942年。
《中央日報》，重慶，1942年。
《公論月刊》，重慶，1944年。
《民報》，臺北，1945年。
《東南海雜誌》，重慶，1944年。
《臺灣研究季刊》，重慶，1945年。

四、專書

- 王一鳴，《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9年。
古川萬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東京：東京書籍，1991年。
李作華編，《世界弱小民族問題》。上海：上海太平洋書店，1929年。
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二版一刷。
秦郁彥，《日中戰爭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7年。
陳三井，《中國國民黨與臺灣》。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年。
葛生能久，《日韓合邦秘史》，下卷。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0年。
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10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第9卷·革命志抗日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9年。
鄭梓，《戰後臺灣的接收與重建——臺灣現代研究論集》。臺北：新化圖書公司，1994年。



顧頡剛、史念海，《中國疆域沿革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

五、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矢野仁一，〈滿蒙藏は支那本來の領土に非る論〉，《外交時報》，第35卷第1號（1922年1月）。

李雲漢，〈抗戰期間臺灣革命同盟會的組織與活動〉，《東方雜誌》，復刊第4卷第5期，（1970年11月）。

林泉忠，〈開羅會議中的琉球問題：從「琉球條款」到「中美共管」政策之過程〉，《亞太研究論壇》，第64期（2017年6月）。

呂芳上，〈抗戰期間在祖國的臺灣光復運動〉，《新知雜誌》，第1卷第5期，（1971年10月）。

呂芳上，〈臺灣革命同盟會與臺灣光復運動（1940-1945）〉，收入氏著，《民國史論（下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

洪桂己，〈從開羅會議到臺灣光復〉，收入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四冊。臺北：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5年。

陳三井，〈臺灣光復的序曲：復臺準備與接收〉，收入魏永竹主編，《抗戰與臺灣光復史料輯要》。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

張瑞成，〈臺籍志士與國民政府復臺工作之籌劃——從開羅宣言談起〉，收入張玉法主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7年。

六、網路資料

蔣中正，〈日本之聲明與吾人救國要道〉，收錄於「《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二·演講」：http://www.ccf.org.tw/ccc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387:0023-3&catid=134&Itemid=256（2025/7/10點閱）。

蔣中正，〈完成民族主義維護國際和平〉，收錄於「《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十一·演講」：http://www.ccf.org.tw/ccc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426:0025-11&catid=154&Itemid=256（2025/9/2點閱）。

蔣中正，〈對日抗戰與本黨前途〉，收錄於「《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十五·演講」：http://www.ccf.org.tw/ccc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113:0016-7&catid=143&Itemid=256（2025/8/11點閱）。

蔣中正，〈政府與人民共同救國之要道〉，收錄於「《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七·專著」：http://www.ccf.org.tw/ccc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13:0007&catid=118&Itemid=256&limitstart=1（2025/11/16點閱）。